

20 世纪

中国 散文

袁勇麟 主编

杨朔

《一个王朝的背影》
《大地上的事情》
《这种感觉你不会懂》
《火车记》
《女孩子的花》
《独立花吹雪》
《华表的沧桑》
《丁香花下》
《况钟的笔》
《永远的校园》
《以爱心 以沉静》
《捉不住的融风》
《寒风吹彻》
《它们》
《黑夜与呼吸》
《读沧海》
《秦腔》
《大渡河钟声》
《说不尽的狗论》
《霞》

邓拓

余秋雨

史铁生

贾平凹

杨绛

王小波

苇岸

读本（当代）

海峡文艺出版社

I267-43
Y923



20世纪

中国 散文

读本

袁勇麟 主编

(当代)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散文读本/袁勇麟主编.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1 世纪高校文科教材

ISBN 7—80640—892—4

I. 2… II. 袁…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
—20 世纪—高等学校—教材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0550 号

20 世纪中国散文读本

主编:袁勇麟

责任编辑:任心宇

出版发行: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350001

发行部电话:0591—87536724

印刷:福州屏山印刷厂 邮编:350003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字数:400 千字

印张:21.125 插页:2

版次: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11 月第 3 次印刷

ISBN 7—80640—892—4/I·608

定价: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导 言

当代中国散文发展以1976年为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至1976年的27年间，散文创作经历了所谓“复兴”、“丰收”和“空白”几个时期，由于当时思想文化封闭，个性意识丧失，散文从内容到形式大都过于循规蹈矩，日趋模式化。而且由于“工具论”、“武器论”、“骑兵说”、“形散神不散”等框框套套的束缚，导致散文严重异化。因此，曾经在现代文学中大放异彩、被鲁迅认为成就“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的散文小品，此时已失去往日的风采，再也没有出现朱自清当年所描绘的现代散文的繁荣景象：“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这种生动活泼、异彩纷呈的散文创作局面，只有在新时期的文坛中才又重现，甚至有了新的突破。许多散文家不仅走出杨朔、刘白羽和秦牧三家的模式，而且也不满足于现代文学史上的“百家手法”，他们主张要创造出“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琳琅满目的新文体、新形式来”。

—

共和国初期的散文，是在继承“延安散文”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表现“新的世界”和“新的人物”要求文学具有“颂歌”的基调。1951年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斯大林给杰米扬·别德内依同志的信》的中文译文，斯大林直截了当地给作家艺术家规定的任务是充当“先进阶级的歌手”。散文因为短小灵活，在配合政治任务，表现新人新事，讴歌英雄模范方面，更是发挥了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所不能代替的作用。汪曾祺在《当代散文大系总序》中指出，20世纪50年代的散文，“不管什么题目，最后都要结到歌颂祖国，歌颂社会主义，卒章显其志，有点像封建时代的试帖诗，最后一句总要颂圣”。而且，这一时期的散文基本上还保持着“通讯”、“报告”、“特写”的格局，纪实性散文多，狭义的抒情散文，或曰“美文”、“艺术散文”少。于是最被认可的散文作品都

或多或少地带有某种通讯报告的色彩，50年代初最著名的散文就是魏巍的朝鲜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此外如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菑子的《从上甘岭来》、臧克家的《毛主席向着黄河笑》、老舍的《我热爱新北京》、李若冰的《在柴达木盆地》、叶圣陶的《游了三个湖》、曹禺的《半日的“旅行”》、杨朔的《滇池边上的报春花》等等，都是以客观的纪实或叙事为主。当时权威的散文选本也大都冠以“散文特写”的名称，以至于7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在选编建国三十年来散文作品选时，还是取名《1949~1979 散文特写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们在评价50年代初期的散文创作时，一般都认为这一时期的散文家“忽视了散文体式的文学化特征，并且过于将散文混同于一般的通讯报告，降低了散文的美学品位”。其实这只是看到主流话语和权力话语下的散文创作情况，而在文坛边缘，一些曾经有过“不光彩历史”的人如“汉奸文人”周作人、“鸳鸯蝴蝶派作家”周瘦鹃等人的“民间创作”，却长期以来为文学史所忽视。这不仅仅是一种“疏漏”，更反映出长期以来在知识话语的霸权中所形成的散文观对“民间散文”的漠视。

周作人从1949年11月22日开始至1952年3月15日止，以申寿等笔名，在上海的小报《亦报》副刊“隔日谈”和“饭后随笔”栏中，发表了908篇随笔小品，另外从1950年1月10日至3月27日，还在另一份小报《大报》上发表了43篇随笔小品。其中除一部分是回忆鲁迅及其创作的文章，曾结集为《鲁迅的故家》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出版外，其余大部分文章当时均未结集出版。由于《亦报》、《大报》在文艺界、学术界影响不大，因而长期以来这些文章被埋没了。直到1988年1月岳麓书社出版《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一书，才使这些散文重见天日。

周作人在《亦报》、《大报》上写的这些随笔小品都非常短，每篇大约五六百字。他自定两个标准：“一是有意思，二是有意义，换句话说也即是有趣与有用。”周作人丝毫不鄙薄这些短文的写作，他说：“从前杂志和报章上，有设杂感录这一栏的，长的可以有一二千字，短的几百到几十字，却很有力量，《新青年》上这与通信都很着重，对于旧势力的战斗往往在那里展开来，比长篇大文更为得力。我们现在写的小文，统系上可以说从那里来的，就是战斗性渐减少了，篇幅的短本来合格，……”他的这些随笔小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天文地理，花鸟虫鱼，三教九流，衣食住行，无所不谈。从“梅兰竹菊”到“龙凤龟麟”，从《艳史丛编》到《聊斋志异》，从“日本民谣”到“苏北小调”，从“南北的点心”到“男女的装扮”，从“活无常与女吊”到“汤婆子与脚炉”，从“街坊上的悲喜剧”到“打油诗的文字狱”，从“俗谚的背景”到“师爷的笔法”，从“夜读的境界”到“文章的包袱”，周作人在广义的文化和文化史这个大范围

内，随手拈来都是题目，也都是文章。钟叔河认为：“这类文字，不谈大道理，只是随手记下一点见识或者感受，娓娓道来，情理自见。它们继承了中国历代笔记文的传统，同时又吸取了欧洲 18 世纪随笔文（essay）的特色，……和启蒙时期报章杂说的某种风格是一脉相承。”周作人自己也说他的这些随笔“原以识小为职，固然有时也不妨大发议论，但其主要的还是在记述个人的见闻，不怕琐屑，只要真实，不人云亦云，他的价值就有了”。

周瘦鹃建国后长期以大量精力从事园艺工作，是江南著名的园艺家。他在亲手培植花木水石盆景之余，写有大量治艺小札和风物小记，小巧玲珑，清新婉约，高雅闲适，别具一格。50 年代周瘦鹃出版了散文集《花前琐记》、《花前续记》、《花花草草》等。周瘦鹃的随笔小品并不追求什么重大题材、重大主题，他说：“除了漫谈我所喜爱的花木事而外，也谈及文学艺术名胜风俗等等，简直是无所不谈。”他的花草随笔多不胜数，如《山茶花开春未归》、《杜鹃花发映山红》、《国色天香说牡丹》、《梅花时节话梅花》、《一生低首紫罗兰》、《一年无事为花忙》、《忽见陌头杨柳色》、《最是橙黄桔绿时》、《花雨缤纷春去了》、《柿叶满庭红颗秋》等，出之自然，挥洒而成，篇幅短小，清灵秀丽。尤其是周瘦鹃博览诗书，他在随笔小品中常常广征博引，将历史、民俗、典故与古诗词熔铸于一炉，涉笔成趣，给人以知识的魅力和闲谈的情趣。周瘦鹃的随笔小品虽然貌似山野自生的闲花野草，但是却自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写：“愿君休薄闲花草，万国衣冠拜下风。”

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散文的多本质性缺乏理解，排斥大量知识性、闲适性和趣味性的随笔小品，把它们当成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趣”而否定禁绝了。周作人和周瘦鹃等人的随笔小品被长期忽视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有到了新时期，先前恶性发展到偏执狂热的极“左”政治意识被广泛宽松的建设性的文化意识所取代，海阔天空、纵意而谈的文化随笔小品才日渐兴盛起来。唐弢在 1982 年曾指出：“有人提出所谓学者的散文，就是那种笔记式的和随笔式的散文，我以为都可以写，海阔天空，古今中外，什么都谈，有的是掌故考证，有的是生活漫谈，类似英国的所谓 familiar essay，信手拈来，娓娓而谈，使人觉得亲切，有味，可以有益，也可以有战斗性。”

二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文坛曾出现过“复兴散文”的运动。大概鉴于建国初期“精心写作美文的传统，我们继承和发扬得似乎尚不够；散文作品中可以称得上美文的，毕竟还不算多”，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胡乔木，在 1956 年 5 月毛泽东正式提出“双百”方针后，“多次呼吁

‘复兴散文’，他再三强调要继承‘五四’以来散文随笔的优秀传统，还特别指出要提倡美文”。尤其是胡乔木主管的《人民日报》一改过去生搬苏联《真理报》没有副刊的做法，于1956年7月1日创办了文艺副刊。《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在初创到1957年“反右”前夕的近一年时间里，发表了大量老作家和新人的散文、随笔、小品和杂文，一时间异彩纷呈，大有“山阴道上目不暇接”的景象。散文评论家余树森认为：“《人民日报》可谓开风气之先者，其文艺副刊成为培养散文鲜花、新苗的沃土和园地。不少传诵一时的好散文均出自这片沃土，像白桦的《洛阳灯火》，万全的《搪瓷茶缸》，何为的《第二次考试》，梅阡的《春夜》等等。”正是由于《人民日报》观念上的导向，使散文创作在1956年下半年明显地出现了转机，艺术散文和杂文（小品）在建国后第一次生动地勃起。周立波的《灯》，老舍的《养花》，杨朔的《香山红叶》，秦牧的《社稷坛抒情》，郭风的《叶笛》等，都写在这一时期。这些散文，其思想的活泼程度、文笔的洒脱情况，在17年间的创作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1956年仿佛是一座分水岭，标志着我国当代散文审美层次的第一次升华和飞跃”。

在这一次短暂的“复兴散文”的运动中，艺术散文方面，叶圣陶、郑振铎、许钦文、丰子恺、老舍、巴金、李广田、李霁野、方令孺等老作家生机焕发，他们的散文既洋溢着新的时代气息，又保留着“五四”散文传统的流风余韵，对正在处于审美调整中的散文创作，无疑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而郭风、何为、菡子、柯蓝、李若冰、林遐、杨石等一批散文新人则在此散文环境的培育、熏陶下迅速崛起，奠定了他们在当代散文史上的地位。另外，与建国初期散文特写多表现国际国内大事、描绘时代风云人物相比，这一时期的艺术散文创作开始注意对个人所独有的见闻、感思的抒写，散文作者的审美观照也向周围的平凡细小事物转移，诸如灯火、茶缸、红叶、吃茶、养花、叶笛之类的题目常见诸报刊，而且艺术散文逐渐由叙事体制向抒情体制转变，散文家的文体意识也有所加强。当然，鉴于50年代中期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的制约，这次“复兴散文”运动只是赢得散文美学特征的部分回归。随着1957年“反右”运动、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开展，散文创作重新陷入困境。

与艺术散文的短暂兴起相一致，杂文也在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杂文传统的基础上，迎来了建国后第一次创作高潮，而且似乎杂文比艺术散文取得的成就为大。黄秋耘说：“50年代前期，举国一致地从事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建设，人人都丹心似火，壮思欲飞，随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的提出，作为人民代言人的文学家更感到创作和言论的自由，寓意抒怀，无所顾虑，尤其是杂文的创作，更是笔气纵横，豪情洋溢，佳作纷呈，名篇迭出。”改版后的《人民日报》同样在大胆提倡和刊登杂文这一点上，对全国报刊起了带头作用。据当时担任《人民日报》杂文编辑的

蓝翎统计,从1956年7月1日到1957年6月6日,不到一年时间里,《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共出了303期,发表杂文500多篇,作者200余人。篇目之多,作者之众,影响之大,实属空前。许多著名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巴金、老舍、艾青、夏衍、田汉、何其芳、巴人、徐懋庸、邓拓等都参加了杂文创作,还有一批刚学写杂文的“小字辈”如邵燕祥、唐达成、鲍昌、蓝翎、邓友梅、焦勇夫、陈泽群以及姚文元等,也加入杂文创作队伍。在《人民日报》的带动和影响下,《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报·晚刊》、《新华日报》、《长江日报》、《文艺报》、《新观察》等报刊也相继开辟杂文专栏,发表了不少精彩的杂文篇章。

徐懋庸和巴人是这一时期最为活跃的两为杂文家。徐懋庸说,建国后由于“气候的关系”,他“噤若寒蝉”,直到1956年7月,“《人民日报》改版,在八版上又出现了杂文,我在汉口,读着读着,有一天忽然又发生了一个想头,现在的杂文,似乎我也可以写一点,于是寄了一篇去”。这就是他以“弗先”笔名所写的第一篇杂文《想到〈活捉〉》。在《人民日报》编辑的鼓励下,徐懋庸把积压胸中多年的一些感想陆续付诸笔墨。从1956年11月到1957年8月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徐懋庸以弗先、回春等笔名,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的报刊上发表了近100篇杂文。徐懋庸这一时期的杂文,矛头主要指向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它们的根子封建主义,他对特权思想、不民主作风、不尊重科学的蛮干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猛烈的抨击。而且徐懋庸善于运用辩证法,在杂文中抓住矛盾,从对立双方分析事物的本质,如《批评和团结》、《老实和聪明》、《简单与复杂》、《英雄的意志和感情》、《敌与友的关系》、《同与异》、《社会的爱护和自己的奋斗》、《“思”和“随”》、《不要怕民主》和《不要怕不民主》等文,都是从社会人生的一系列矛盾现象中分析出问题的实质关键,使读者不得不折服于他的哲学思辨力。徐懋庸的这些杂文被认为“其锐利、泼辣不减当年,但更深沉、更周密、更冷静,文字也更朴实、老练。这些杂文无疑是徐懋庸最成功的作品,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杂文领域中最富有战斗力的篇章。它的意义,不仅仅限于它所揭露和讽刺的,而在于表明了一个杂文作家所应当坚持的战斗方向和杂文在新时期所应当发挥的战斗力量”。

巴人被赞为“50年代最富有战斗力的杂文家之一”,他的杂文名篇《况钟的笔》为了配合昆曲《十五贯》在北京的上演,于1956年5月6日刊发在《人民日报》上,在全国范围内产生深远的影响。当时有读者写信到《人民日报》编辑部称:“这是一篇出色的杂文,我曾经一连读了三遍。我希望像这样针砭时弊的文章,《人民日报》能经常刊登,希望老一辈的作家——像巴人等,今后多多使用杂文这一锐利的武器。”可以说,巴人的这篇杂文揭开了1956年下半年兴起的杂文创作高潮的序幕。在《“上得

下不得”与《“多”和“拖”》两篇杂文里，巴人所批评的“公文旅行”和“画圈主义”的现象，“多”和“拖”的痼疾，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读来仍有发人深省的作用。如果说“十年浩劫”中出现了对人的意志、权利和情感的粗暴践踏的话，那么，早在50年代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某些端倪。巴人对此非常敏感，他在1957年选编杂文集《遵命集》时，在《编后记》中说：“这一年多来我的思想的变化，在这个集子里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似乎对于‘人’这个社会存在，更引起注意和关心了。”并认为“对待一切工作”，“人是相与始终的主体”。他在《论人情》、《唯动机论者》、《“敲草榔头”之类》、《略谈要爱》、《真的人的世界》等杂文中，呼唤对人的尊重，包括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感情，猛烈抨击搞无情斗争、残酷打击的粗暴方法。巴人在50年代中期所写的杂文，是对鲁迅杂文的继承和发扬，“是当代杂文史上的珍品，他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丰厚的文化遗产，也是那沉重的教训和常思常新的启示”。

三

1957年的“反右”运动，抑制了散文创作的活力；继之而来的1958年的“大跃进”，则以浮夸的社会风气直接影响散文创作，助长了“假、大、空”之风的流行，导致散文作品远离生活真实。因此，尽管这一时期散文作品满纸豪言壮语，光芒万丈，却始终掩盖不了其中苍白肤浅、浮夸空洞的实质，因而缺乏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创作中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也引起人们的警惕。1959年2月18日至27日，中国作协召开文学创作工作座谈会，茅盾在《创作问题漫谈》的发言中，肯定了一年来的创作成就，同时批评了创作上题材狭隘，因为对革命浪漫主义的误解而造成的浮夸、空想以及片面理解为生产、为中心工作服务的错误倾向。老舍在《规律与干劲》的发言中，指出“文艺创作自有它本身的规律，不能专凭擦拳摩掌就写出作品来”，主张“跃进计划应当数量与质量兼顾，规律与干劲平衡，在体裁上力求百花齐放”。与此同时，《文艺报》从1959年第14期开辟了“让散文这枝花开得更绚丽”的专栏，先后发表了冰心的《关于散文》、秦牧的《散文领域——海阔天空》、柯蓝的《我谈〈早霞短笛〉》等文章。秦牧认为：“我们现在所谈到的散文，精粹警辟的、谈笑风生的、亲切感人的、玲珑剔透的，使你读时入了神、读后印象久久不会消失的，还是不多。我们有理由来关心，来呼吁：让这枝花开得更加绚丽些。”他具体指出：“除了国际、社会斗争、艺术理论、风土人物志一类的散文外，我们应该有知识小品、谈天说地、个人抒情一类的散文。”

由于“大跃进”的失误，我国国民经济不仅未能实现“跃进”，相反却造成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国民经济的严重倒退，粮食缺乏，通货膨胀，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加上“反右派”、“反右倾”一系

列运动，伤害了不少人，文化科学界知识分子普遍感到思想压抑，心情不舒畅。为此，中共中央于1960年9月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这种情况下，胡乔木写信给《人民日报》，要求“副刊有责任鼓励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发扬乐观向上的精神，帮助人们有丰富、健康、积极的精神生活，但也不要说大话、说空话”，他具体建议“可以约写一些读书笔记的稿件，提倡多读书，多读古今中外的好书，从中获得思想上的教益，也增加知识，提高文化素养”。在胡乔木的指示下，从1960年冬天开始，《人民日报》陆续开辟了一批有关读书的栏目。

正是在散文创作开始逐步回归自身艺术规律之时，《人民日报》从1961年1月28日至6月5日，开辟“笔谈散文”专栏，先后发表了老舍的《散文重要》、李健吾的《竹筒精神——一封公开信》、吴伯箫的《多写些散文》、师陀的《散文忌“散”》、凤子的《也谈散文》、柯灵的《散文——文学的轻骑队》、蹇先艾的《崭新的散文》、秦牧的《园林·扇画·散文》、许钦文的《两篇散文，两种心境》、萧云儒的《形散神不散》、菡子的《诗意和风格》、黄秋耘的《向“永州八记”取点经》等20篇文章。此外，冰心、郭预衡、徐迟等人也在《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长江文艺》等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论述散文的文章。这些文章从理论上推动了当时散文创作的发展，当代散文继1956年之后出现了第二次全面发展的短暂时期，以意境隽永、文体优美为特征的“诗化”抒情散文大量涌现，如杨朔的《雪浪花》、《茶花赋》、《荔枝蜜》，刘白羽的《灯火》、《日出》、《长江三日》，秦牧的《土地》，吴伯箫的《歌声》、《记一辆纺车》，冰心的《一只木屐》，曹靖华的《花》、《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袁鹰的《青山翠竹》，魏钢焰的《船夫曲》，季羡林的《马缨花》，杨石的《爱竹》等篇章，都曾在读者中广为传诵，脍炙人口，1961年因此被称为“散文年”。另外，在邓拓的“燕山夜话”杂文专栏和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合作的“三家村札记”专栏的影响下，一时间杂文又成为报纸文艺副刊的“旗帜”，全国许多报刊纷纷重新开设杂文专栏，开始大量刊载杂文，共同推动建国后杂文创作的第二次高潮。

60年代初期，散文界兴起“诗化”散文的创作热潮，这是对散文审美性回归的努力。杨朔最早致力于“诗化”散文的创作，他说：“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我向来爱诗，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练的古典诗章。这些诗差不多每篇都有自己新鲜的意境、思想、情感，耐人寻味，而结构的严密，选词用字的精炼，也不容忽视。我就想：写小说散文不能也这样么？于是就往这方面学，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而且凡遇到“动情的事”，“我就要反复思索，到后来往往形成我文章里的思想意境。动笔写时，我也不以为自己是写散文，就可以放肆笔墨，总是像写诗那样，再三剪裁材料，安排布局，推敲字句，然后写成文章”。因此，不

管是“杏花春雨”，还是“铁马金戈”，杨朔都善于从中发掘出生活的诗意，在他笔下，处处洋溢着诗意的光辉。当时不仅杨朔一个人追求“诗化”散文创作，女作家菡子在《作家自述》中谈及自己的创作时也说过：“我极盼自己的小说和散文中，在有充实的政治内容的同时，有比较浓郁的抒情的调子，并带有一点革命的哲理，追求诗意的境界。”由此可见，这是当时整个散文创作共同追求的方向。而且在“笔谈散文”中，就有两篇理论文章同时取名《散文的诗意》。刘昭明认为：“情文并茂，充满诗意，是时代对散文提出的要求。我们时代的生活是充满诗意的。劳动人民改造社会征服自然的壮举，层出不穷的激动人心的新人新事，都要求在散文——文艺的‘突击队’和‘轻骑兵’——中得到完美的反映，以鼓舞和推动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李元洛也指出：“我们虽不能把散文和诗混为一谈，无视二者的区别，但散文中的诗意，却是我们的作家应该刻意追求的。”

正是由于杨朔等人用诗的审美价值提高了抒情散文的地位，一时间，追求诗意成了60年代初期散文创作的共同潮流。刘白羽的代表作《日出》、《灯火》、《长江三日》、《樱花漫记》、《平明小札》和《冬日草》等，都写得诗意盎然。他在回忆自己的散文创作历程时指出：“在和平建设时期，虽然我又拾起笔写散文，但经历革命与战争的锤炼，我的散文终究失去了旧世界打上的某些烙印；我从《从黄昏到夜晚》、《绿》、《关于长城的回忆》那种缠绵悱恻中挣脱出来，就像抖落了昨天的一身灰尘，走上今天新的路程，我有了我的散文的新格调。……《日出》、《长江三日》、《平明小札》是我对新的美的探索的结果。”他这种新的审美观就是诗意与政论融合的“激流勇进之美”。秦牧的散文公认以知识性见长，但他60年代初期的散文创作也明显受“诗化”的影响，如他的代表散文集《花城》就是向抒情散文倾斜的重要标志，创造了一个哲理和诗情交融的境界。秦牧虽然没有提出类似于杨朔的“把散文当诗一样写”的鲜明“诗化”理论主张，但他也认为散文创作应该向诗人学习。他说：“写散文比较写长篇巨著容易，这只是相对的说法罢了。如果同样以写一千字所花的精力来说，写散文就不见得比写其他体裁的作品容易了。在一篇小小的文章中，要有新意，有感情，有鲜明形象，有警辟语言，耐人看，耐人想，这就煞费作者一番心思了。但好在在这个问题上，诗人、巧匠、画师、花王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典范，大可借镜。诗人有时仅仅用一两句话，就引人入胜，把我们给攫住了。像‘三万里河东入海，八千仞岳上摩天’‘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之类的诗句，可不就是这样么！”杨朔、刘白羽和秦牧的散文创作，集中体现了本时期散文创作“诗化”的特征，并影响着当时和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散文创作，从而成为27年主流权力话语下最著名的三位散文家，号称散文“三大家”，并形成“杨朔模式”、

“刘白羽模式”和“秦牧模式”。

应该说，杨朔等人强调散文的抒情性，甚至极端地把散文当成诗来写，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有其合乎规律的一面。但是，杨朔等人在恢复、强化散文的审美价值的同时，也带来散文题材上回避尖锐矛盾，只满足于“酿造出甜美的诗意”；构思、表现方法上路子过于狭窄，写法单调且成模式化的缺陷。沈从文在1961年就看出：“散文和诗写到景物时，都不知如何着手，文字不够用似的，也一点不真实。恐怕和每年选的选本作为标准也有关系。大家都用来学习，取法，越学范围越窄，再也无希望从文字上见新风格，或性格（恐怕得想点办法了）。”反而是当时并无意公开发表的《傅雷家书》和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成为这一时期散文的精品，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显示出其不可磨灭的文学价值。

在杂文创作方面，邓拓从1961年3月19日至1962年9月2日，每星期二、四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上开辟“燕山夜话”杂文专栏，以“提倡读书、丰富知识、开阔眼界、振奋精神”为宗旨，共发表了153篇杂文。《燕山夜话》以它深刻的思想、丰富的知识和特有的文采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他还与吴晗、廖沫沙合作于1961年10月至1964年7月，在《前线》杂志开辟“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共发表了62篇杂文。邓拓是这一时期成就最大的杂文家，他在人们司空见惯、不容置疑，甚至奉若神明、大唱赞歌的事物上，看出了一场严肃的荒唐和可笑的荒谬；在举国狂热、舆论一律的政治气氛之下，喊出了不同的声音；在人们浑浑噩噩、糊里糊涂之际，写下了一些真理性的认识。他的杂文《一个鸡蛋的家当》、《废弃“庸人政治”》、《专治“健忘症”》、《“伟大的空话”》等，都是暴露“大跃进”运动中浮夸风危害的力作。邓拓同时又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背景和广博知识结构的杂文家，在60年代初期思想文化封闭、创作个性失落和杂文艺术趋于单调划一的情况下，他突破了杂文创作的狭窄空间，驰骋在大文化的广阔天地里。邓拓的许多杂文纵谈读书治学、人生修养、历史文物、民俗人情、草木虫鱼，作品视野开阔，气象恢宏。曾彦修称“邓拓应是新中国建立四十年来首屈一指的杰出的杂文家”，卫建民认为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当代散文史里的灿烂篇章”。

在邓拓的影响下，许多报纸开设了杂文专栏，如《人民日报》的“长短录”，《重庆日报》的“巴山漫话”，《成都晚报》的“夜谈”，山东《大众日报》的“历下漫话”，《云南日报》的“滇云漫谈”，《合肥日报》的“肥边谈屑”，《西安晚报》的“秦中随笔”，等等。由于当时50年代中期的一大批杂文作者仍处于“摘帽右派”的尴尬地位，他们心有余悸，噤若寒蝉，因此，这次杂文兴起创作队伍主要以党政机关相当高一级的领导干部为主。而且，与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那次锋芒毕露、直接抨击时弊、触及重大政治问题的杂文有明显的不同，这一时期的杂文主要以

古论今，旁敲侧击，在向人们传播知识道理的同时，提倡科学、民主、实事求是的精神，并以此针砭时弊。遗憾的是，60年代初期的杂文创作高潮并没有维持多久，1962年底，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燕山夜话”停笔了，“长短录”不再发稿了，全国各地曾经轰轰烈烈一阵的杂文专栏大都夭折了。

四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上海三次与康生、江青等人谈话，点名严厉批评了邓拓、吴晗、廖沫沙合作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说他们“贩卖封、资、修毒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5月8日，江青、张春桥主持的写作班子抛出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以显著位置刊在《解放军报》。同日，《光明日报》也以显著位置刊登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5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抛出经毛泽东审阅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从此掀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邓拓于5月18日凌晨含冤自杀，成为那场亘古未见的文字狱的第一个牺牲者。稍后，老舍投湖自沉。1967年，“寿多则辱”的周作人离开了人世。1968年，杨朔、李广田、周瘦鹃被迫害致死。1969年10月10日，吴晗死于狱中。1972年7月25日，巴人精神错乱，含冤辞世……此外，一大批散文家遭到批斗，“以言治罪”、“以文治罪”的批判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十年浩劫”中的中国成了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下的“万马齐喑”局面，这从根本上摧毁了散文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因此人们常常称这一时期是散文的“空白”期。但是，正如秦牧所说：“无声的时代，必然有地火在奔突，有风暴在酝酿。”在极“左”思潮支配了整个思想界，登峰造极的文化专制主义垄断了新闻、出版，垄断了全部精神文化产品的制作的情况下，丰子恺的随笔和恽逸群的杂文有如那“地火”和“风暴”，是“一塌糊涂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丰子恺曾于1957年11月，将建国前的旧作《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车厢社会》、《率真集》以及抗战中的散文自留稿选出59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版《缘缘堂随笔》。1962年，他又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之约，将1956年至1962年间创作的32篇散文随笔编成《新缘缘堂随笔》，后因发表在1962年8月号《上海文学》上的散文《阿咪》受批判牵连，这本散文集终未能出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丰子恺受冲击，身心备受折磨，一度曾被关进“牛棚”。1971年4月开始，丰子恺利用凌晨时分悄悄创作《往事琐忆》系列随笔（1973年修改时，改名为《续缘缘堂随笔》，最后定稿时取名为《缘缘堂续笔》），一共33篇。这些随笔作

者生前未发表过，其中17篇曾收入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5月出版的《缘缘堂随笔集》，1992年6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和浙江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丰子恺文集》第6卷收入了全部33篇随笔。

丰子恺创作于1971年的这些随笔，有回忆家乡的风土人情，描写自己孩提时代的所见所闻，如《牛女》、《酒令》、《癞六伯》、《菊林》、《五爹爹》、《王囡囡》、《四轩柱》、《小学同级生》等，有记述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所发生的事件，如《砒素惨案》、《三大学生惨案》、《陶刘惨案》等，也有揭露旧社会丑陋阴暗面的文章，如《算命》、《旧上海》、《歪鲈婆阿三》等。这些随笔依然保持他一贯的艺术风格，平易、自然、朴实、隽永，虽属怀乡忆旧之作，但笔调潇洒，语言富有情趣，风格醇正淡雅，如叙家常，娓娓动人。尤其是《暂时脱离尘世》一文，颇能发人深省。这篇随笔为我们理解丰子恺创作《往事琐忆》提供了线索。它表明正直、率真的丰子恺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即使不能写直接反映现实的作品，也决不会迎合那种虚情假意的恶劣文风，更不会违心听任“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摆布。正像徐开垒所说：“我有幸读了这些遗作，非常钦佩子恺先生能在这样严峻考验下，坚持文学创作，特别是依然能保持洒脱、朴素、幽默的文风，写出了富有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的随笔，不拘一格地怀乡怀人。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这些随笔小品，都发自肺腑，写在1972年（有误，系1971年——编者）这样一个帮风帮气遮天遍地的生活环境中，文章竟毫不受它的影响，心平气和，叙事议人，既像亲人谈话，又似长者叮咛。”“由此，我愈益感到随笔是外衣，而诚实却是灵魂。子恺先生的随笔写得好，使人感到，因为他所叙的事是实在的，所发的议论是诚恳的。而当时他所处的环境却十分险恶，当时所流行的却是与随笔这一形式完全对立的東西：大批判文章。好的随笔要求的是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娓娓道来，叫人心服；后者则阴险残忍，动辄引咎，张牙舞爪，以势压人。”确实，在“文革”十年充斥“大批判文章”的话语霸权环境里，丰子恺的随笔以冷峻深刻的思想和超脱的情趣观察事物，文章短小，感情深沉，笔调亲切生动，在从容中见功力，于细微处显幽趣。它以清新的风格，睥睨当时主流权力话语的八股陈词滥调，尤为难能可贵。

恽逸群建国后曾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等职，1951年在“三反”运动中，因将报社存款借给友人开采小煤矿事，被责令停职检讨，并于1952年3月被开除党籍。1955年受“潘汉年杨帆事件”牵连，蒙上莫须有的叛徒、汉奸罪名，被捕入狱。狱中十年，独囚一室，与世隔绝。1965年底出狱后，被贬谪到江苏阜宁县中学图书馆管理图书。不久，又逢“文革”动乱，被关进“牛棚”，惨遭迫害。他在1973年7月8日写给胡愈之的信中说：“弟之遭遇，非楮墨所能宣。但既未抑郁萎顿而毕命，亦未神经错乱而发狂。平生以‘不以物移，不为己忧’自

律，经此二十年检验，幸未蹈虚愿。”即使身处逆境，恽逸群仍然“位卑未敢忘忧国”。他在1973年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表示：“文化大革命中怪论层出，忧心如捣，强自抑制，自念既被剥夺发言权，也就没有发言的责任，以中国之大，何待于‘罪人’之喋喋不休，终不能忍。……逸群被逐出党已逾廿一年，戴上‘反革命’帽子已逾十八年，理合谨小慎微，依违从众，唯唯否否，以终余年，庶几邀人怜悯，复为庶民，但平生既耻为乡愿，不惯于趋向潮流，荣辱祸福，久置度外，心所谓危，不敢不言，苟于党于民有毫发之益，则摩顶放踵，亦所不吝。”

正是出于“心所谓危，不敢不言”的凛然正气，恽逸群于1973年写下了《略谈“个人崇拜”》和《论新八股》。在前一篇杂文里，他对当时泛滥一时的个人崇拜现象产生的根源及其在社会上造成的严重恶果，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揭露了“造神运动”的本质在于：“蓄意篡夺权力的奸人，就千方百计地提倡个人崇拜，把最高领导人宣扬为几乎全知全能的超人，大树特树其绝对权威。一方面用无数面凸镜包围最高领导人，让他终日陶醉于欣赏自己的高大形象，逐渐脱离群众；一方面就利用最高领导人的信任，以封住群众（从人民到领导机构的成员）的嘴（因为“一句抵万句”，非权威的人说上一大船管什么用）。领袖成了偶像，群众成了崇拜偶像的愚民，天下大事就不难任凭他为所欲为了。”在后一篇杂文中，恽逸群针对“四人帮”及其北门学士之流的“帮八股”，指出这种断章取义、任意歪曲革命导师言论的“新八股”比老八股的危害性要大得多，因此，他呼吁：“现在对八股化文风来一次彻底革命，应该是的时候了。”

恽逸群在1971年10月12日写给妻子刘寒枫的信中说：“我对于自己认为不妥的事，不论对方的地位多高，权力多大，我都要说明我的看法和意见。”“过去我曾说过：‘我是在八卦炉中炼过的。’这句话是两个意义，一、不怕腐蚀；二、炼出了火眼金睛，能看出妖魔鬼怪，虽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但要长期瞒过我是困难的。我看人看问题并不尖刻，对非本质的事很马虎，对本质的东西一旦抓住就不放，就是要揭它的皮。”正是在“八卦炉中”炼出了“火眼金睛”，所以，恽逸群才能目光如炬，才在“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中发出隐隐的雷鸣。曾彦修称他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真正的精英人物”，牧惠说他是“中国的脊梁”。在“十年浩劫”的漫漫长夜中，正是有了恽逸群这类“精神界之战士”的出现，才给当代杂文的再一次复兴带来希望的曙光，毕竟“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五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有着灿烂悠久传统的散文创作，度过了“十年浩劫”“北风卷地白草折”的漫漫岁月，在新时期砸碎了长期禁锢着人民的精神枷锁，冲开了久被封闭压制的情感闸门，呈现出

冬眠后的复苏的勃勃生机。1981年,全国散文创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建国后第一次有关散文创作的盛会。同年,《文艺报》从第三期开始,开辟了“我与散文”专栏,先后发表了碧野、黄秋耘、柯蓝、李若冰等人的文章。1982年,《文艺报》又以“繁荣和发展散文创作”为总题,专门发表了冰心、叶圣陶、臧克家、冯牧、李健吾、季羨林、吴伯箫、叶至诚等人的专论。与此同时,1980年第1期的《文艺报》开辟“杂感”专栏,为了办好这个专栏,促进杂文创作,《文艺报》编辑部邀请廖沫沙、王子野、陶白、曾彦修、胡思升、姜德明、冯亦代、叶至善和王春元等人举行座谈,并在该刊第三期发表了他们的发言摘要。1981年4月,《南方日报》“南粤”副刊邀请广州部分杂文家秦牧、苏烈、岑桑、柳嘉、杨群等人,就如何提高杂文的质量,发挥杂文的功能等问题举行座谈,4月22日《南方日报》文艺评论版刊登了部分作者的发言。1982年1月18日和11月22日,《新观察》杂志两度召开座谈会,就发展和繁荣杂文创作等问题,夏衍、廖沫沙、唐弢、宋振庭、谢云、蓝翎、袁鹰等人发表了各自的见解,1982年第4期、第24期和1983年第1期的《新观察》刊登了这两次座谈会的发言摘要。可以说,有关散文和杂文中兴与繁荣的号角,已经吹响了。

1979年6月,《随笔》在广州创刊。1980年1月,《散文》在天津创办。一南一北,各有侧重。《随笔》以有文学色彩的随笔、杂文、文史小品、读书札记擅胜;《散文》则以抒情、叙事、记游的作品为正宗。两本刊物都以自己的优势和特色拥有不同风格的作者,吸引不同层次的读者群。散文创作在文学领域破天荒地开辟了属于自己专门的发表园地,被认为在“当代散文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一种创举”。此后相继创办的专门性散文刊物有《散文选刊》、《散文世界》、《青年散文家》、《散文百家》、《当代散文》、《中华散文》、《美文》、《散文海外版》、《散文天地》等,另外还有不定期散文丛刊《万叶》、《榕树》、《中外散文选萃》、《散文与人》、《读书之旅》等,而且许多文学刊物也每年定期或不定期推出“散文专号”和“散文专辑”。与此同时,1984年10月2日,我国历史上第一家专门刊登杂文的报纸《杂文报》在河北石家庄创办。臧克家说:“《杂文报》为杂文开路,打响了第一炮,响应之声,不绝于耳,足征时代需要,读者欢迎。杂文,这个文学品种,在众人眼目中,附庸蔚然成了大国了。”1985年1月,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杂文理论刊物《杂文界》也在石家庄创办。此后陆续面世的杂文报刊有《杂文家》(后改名为《杂文选刊》)、《杂文》(后改名为《语丝》)、《江苏杂文界》、《当代杂文》、《杂文与生活》等,《河北日报》、《北京日报》、《福建日报》等报纸也相继开辟“杂文专版”。可以说,散文和杂文的园地已不再荒疏,而呈现出春日里欣欣向荣的中兴景象。

在新时期的文艺复兴中，开始形成一支庞大的散文创作队伍，它的成员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所有文学门类中堪称第一。老一辈作家冰心、巴金、施蛰存、季羡林、萧乾、张中行、金克木、孙犁、杨绛、黄秋耘、陈白尘、柯灵、黄裳、贾植芳、谷林、郭风等，组成了散文创作的第一梯队。他们把自己的经验阅历、所遭遇的世道沧桑、人情世故，升华为一种人生哲理，在散文中灵活地表现出来，这是参透了人生艺术的大手笔才能达到的境界。他们全然给人一种饱经沧桑、阅尽人生又深得其中三昧的智者形象，正如李辉所指出：“一些早已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其思想、其笔锋却永远带着青春的活力。像冰心、巴金、萧乾、柯灵等，他们表现出来的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他们表现出来的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其敏感和深刻，在许多方面绝对超出于很多年轻人。阅历的丰富，人生的坎坷，自然是其中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在于他们是智者。”

“老年散文”这一道独特的文坛风景线，它们不仅体现了作者年龄上的特性，而且展示了作家阅尽世态沧桑的睿智与通达，显示了他们渊博的学识和人格的魅力。冰心早年以纯真的童心讴歌母爱，拨动了亿万小读者的心弦，并以她清新隽丽、流畅宛转的散文风格形成了当时广为流行的“冰心体”。到了晚年，冰心的散文于清新柔美中增添了一股刚健方正之气，她的议政论文之作《无士则如何》、《我请求》等，锋芒凌厉，切中时弊。巴金曾写信告诉冰心说，“近九十岁的人了，您还写出叫人感到‘烫手’的文章，使人尝到‘辣味’的作品”，“您的笔还是那么锋利，您还在关心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您是中国知识分子良心”，“我本来就想搁笔，但是看见您那些在暗夜里闪光的文章，我不敢躺倒，不敢沉默，又拿起笔来”。巴金自己也被称作是当代中国良知的代表，他在《随想录》、《再思录》里以真诚、质朴、洗炼的文字抒写了自我在历史沧桑中极其丰富、复杂、深刻的心路历程和感情世界，表现了他的迷惘和探索、愚昧和觉醒、悔恨和痛苦、悲哀和欢乐、失望和希望。《随想录》浸透了一位文化老人对历史、时代、民族和国家沉重的责任感，喊出了中国正直知识分子探索真理的心声，展现出可昭日月的人格光辉。《随想录》标志着当代文学彻底告别夸饰的时代，进入了一个真诚的、敢于说真话的时代。因此，这一部“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说真话的大书”，被誉为“继鲁迅之后，我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又一座高峰”，“这部巨著在现代文学史上，可与鲁迅先生晚年的杂文相并比”。孙犁1956年以后“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新时期以来他潜心著文，出版了《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耕堂读书录》等。他认为散文是一种“老年人的文体”，适合于抒写自己一生的思想和情感的积淀。他晚年“闭门谢客，面壁南窗，展吐余丝，织补过往”，是因为他视散文创作为“最大的最有效